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欧洲的抗争 与民主 (1650—2000)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陈周旺 李辉 熊易寒 译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欧洲的抗争 与民主

(1650—2000)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陈周旺 李辉 熊易寒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美)蒂利(Charles Tilly)著;陈周旺,李辉,熊易寒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1650—2000
ISBN 978-7-5432-1459-0

I. 欧… II. ①蒂…②陈…③李…④熊… III. 民主-政治制度-历史-欧洲-1650~2000 IV. D750.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1985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美术编辑 路 静

·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美]查尔斯·蒂利 著
陈周旺 李辉 熊易寒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www.ewen.cc 格致出版社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59,000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1459-0/C·13
定 价 32.00 元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编委会

主任：史正富

委员：（按汉语拼音顺序）

陈 平 陈 昕 崔之元

何元龙 刘 昶 王小卫

张 军

前言

记性好的读者可能会意识到(这对他们来说不知道是好是坏),本书已经闯入了由我的杰出导师巴林顿·摩尔所开创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本书与摩尔的煌煌巨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颇有不同,后者关注的是民主与民主化,从结果回溯起源来展开分析,通过对英法两国的仔细比较来解释欧洲整体的变化。巴林顿·摩尔的一些崇拜者(譬如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和 John Stephens)通常都追随其学术取向,致力于解释长期的结果——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类型的政体? 尽管本书也考察了特定历史对于当代政治的影响,但主要的研究旨趣是探寻那些促进、阻碍或逆转民主化的机制与过程。换言之,本书所关注的是轨迹而非源头和终点。再者,任何了解摩尔著作的人都会看到,作为他的昔日弟子,本人所要研究的,正是摩尔所强调的斗争(struggle)的政治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与巴林顿·摩尔一样,我没有用天真的眼光来看待实存(actually existing)的民主国家。我知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除了极少的革命时刻,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政权,不是由少数富有而人脉广泛(well-connected)的人——我指的是男人——在其中发挥超乎寻常的影响。据我所知,在每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权中,被污名化(stigmatized)的少数人缺乏使其免于政府专横行为的保护。我认为,美国的政体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民主,由于其人口的某些组成部分(segments)被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由于社会不平等被带入了公共生活,由于民意表达不畅通,由于无法为其公民提供平等的保护,从而使之反复经历着“去民主化”(de-democratize)的过程。在本书中,“民主”仅仅意味着,与大多数其他政权相比,非民主的因素相对较少而已——这在一定程

度上规避了小型暴政(*petty tyranny*)和大威权主义(*monolithic authoritarianism*),这二者是过去五千年世界上最为常见的两种政府形式。

让我列举一下写作本书所面临的三种困难:纵横交错的层次、浩如烟海的文献和充满颠覆性的解释。我对这些难题的解决之道可能给一些读者带来不便。首先,层次的多样性。本书在几个明显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分析:跨越了时代的实质性周期(*substantial periods of time*)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大陆,跨越好几个世纪的欧洲的主要地区,跨越20年至350年不等的整体的国家,对个别地区(譬如大不列颠群岛的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只考察一个世纪以内的不同时间段,以及在具体时间点的特定危机、事件和人物。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我都无法为所有的相关单元提供连续的、全面的证据。我一开始这项研究,就马上取消了给1650—2000年所有欧洲政权的民主化排定座次的原计划;我认识到关键不在于为一个单一变量提供简洁、自洽的解释,而是在多个层次上展开一个复杂的过程。其结果是,提供的证据反复改变着分析的层次,但每个层次的证据都是不完整的。

第二个难题在于,本书利用了欧洲史、民主化、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大量的、孤立的文献。这些领域的专家很可能会觉得我轻视了这些文献当中最受他们青睐的部分,从而认为我的观察和论点的原创性言过其实,当然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分析家对我的描述和解释提出反对意见。我对这种可能性深表遗憾。但我认为,另一个替代方案——对相关文献及其争议完全加以引用并进行讨论——可能更为糟糕。这会导致本书的篇幅增加一倍。为了写一本关于1650年以来全欧洲的著作,我必须反复求助于已出版的文章、专著、综论、手册和百科全书,以便厘清各种事件,制作大事年表,确认地点、事件和人物。除非看起来读者需要再次确认或者对一些论断刨根究底,否则我只是列举那些直接引用的出版物,以及那些从不易找到的文献中析出的证据。

我决定减少对相关文献的索引和讨论,这意味着我要忍住不在现有的争议当中,公开地支持某一方。譬如,只有法国史的研究者才能轻松地发现第四章拒绝了我的朋友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所做的修正。(这一章甚至重新启用了被整整一代法国史学家所辱骂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

我的第三个困难在于解释的颠覆性。常识和大部分的社会科学都把个体的倾向(disposition)作为社会过程的根本动因,文化学者、现象学者、行为主义者以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在用行动的观点来解释个体的行动之前,同时聚焦于个体倾向的重构,然后提出把个体行动积聚为民主化和去民主化之类的社会过程。我对此抱怨多年了,哎呀,通过个体倾向来进行解释的逻辑已经使各种主流的实践之间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别了。本书完全颠覆了主流的实践,不是我自吹自擂,请读者明鉴:本书所提供的解释是不是比通常的解释更能说明欧洲的民主化和去民主化?

本书的解释在三个方面具有颠覆性,在第一章表 1.1 至表 1.3 中列举出来了,以下机制和过程可以用来解释民主化:(1)个体倾向主要是作为结果而非原因;(2)关系机制要优先于环境机制和认知机制;(3)经纪(brokerage)之类的机制与我们所解释的社会过程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运作的,并不总是要转到类似分子过程的化学解释模型这样的微观层次。即使是对那些对解释机制颇感兴趣的少数社会科学家而言,上述三个立场也是颠覆性的。然而,在写作本书时,我觉得既然我的倡导作用甚微,那么,还是让我直接着手于我的解释工作,让读者来判断结果是否具有颠覆性,这样会更好。因而我有时将自己的解释与当前的其他解释相比较,呼吁大家关注各种竞争性的解释逻辑,这绝不是画蛇添足。

我也极力克制这样一种欲望,即把每个观点都扩展为概念化的问题、测量(measurement)、解释和理论构思。譬如,我以前的一些工作就是从煞费苦心的细节中对革命进行概念化和比较,但本书主要满足于对革命做简单的特征描画。那些感觉我行文过于匆匆的读者可以从我的如下出版物中进一步发现相关的更深入的论述:

1993, *European Revolutions, 1492—199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3,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253—280.

1995, "Democracy Is a Lake." In George Reid Andrews and Her-
rick Chapman,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7, "Parliamentarization of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Theory and Society* 26:245—273.

1998, "Democracy,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 Joan M. Nelson, Charles Tilly, and Lee Walker, eds., *Transforming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Economies*.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8, "Armed Force. Regimes, Conten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urope since 1650." Research Monograph 19,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available online at www.democ.uci.edu/democ.

1998, "Regimes and Contention." Columb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line(CIAO) working paper, www.columbia.edu/sec/dlc/ciao/wps/sites/ccs.html.

1999, "Why Worry about Citizenship?" In Michael P. Hanagan and Charles Tilly, eds., *Expanding Citizenship, Reconfiguring Stat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f Democratiz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8:1—16.

2001,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21—41.

2001, (with Doug McAdam and Sidney Tarrow),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Democracy" (vol. 2), "Collective Action" (vol. 3), and "Social Class" (vol. 3). In Peter N. Stearns, ed.,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6 vols. New York: Scribner's.

2001, "Histor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rocesses." In Jonathan H. Turn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Kluwer/Plenum.

2001,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msterdam: Elsevier. Vol. 10:6735—

6757.

2001, "Public Violence."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msterdam: Elsevier. Vol. 24: 16206—16211.

2002, "Neuere angloamerikanische Sozialgeschichte." In Günther Lottes and Joachim Eibach, eds., *Kompass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2, "Event Catalogs as Theories." *Sociological Theory* 20: 248—254.

2002, *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进一步阅读上述著作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本书从上述著述中借用了许多观点和事实(譬如第三章至第五章的革命形势一览表就出自《欧洲革命》(*European Revolutions, 1492—1992*)一书),但是并没有标明出处。此外,对那些我本人以前对本书所涉及主题的论述,本书在使用时就没有再加注释。与以往著述的更多重叠主要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发生:(1)如果我通篇采用了早期的著述;(2)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手稿的修订本就已经出版了。作为这两种情形的结果,本书的某些部分与我的下列著述有明显的重叠之处:

1992, "Cities, Bourgeois,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In M'hammed Sabour, ed.,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Bicentenaire de la grande révolution française*. Joensuu, Finland: Joensuun Yliopisto. University of Joensuu Public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14.

1995,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Social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Citizenship in France and Elsewhere." In Charles Tilly, ed.,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Social Movemnets and (All Sorts of) Other Political

Interactions-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Including Identities, Several Divagations from a Common Path, Beginning with British Struggles over Catholic Emancipation, 1780—1829, and Ending with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27:453—480.

2000, “Struggle,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Waltraud Schelkle, Wolf-Hagen Krauth, Martin Kohli, and Gejorg Elv-ert, eds., *Paradigms of Social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Evolution*. Frankfurt and New York: Campus Verlag and St. Martin's.

此外,第七章主要由我与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合著的《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书的部分文章扩充而来,但也从该书的这一部分“批量”地借用了一些文字。

我要衷心感谢 Ron Aminzade, Wayne te Brake, Carmenza Gallo, Michael Hanagan, Sidney Tarrow, Nicholas Toloudis, Takeshi Wada, Viviana Zelizer, 还有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评审人, 布兰登堡(Brandenburg)科学研究院的听众, 康奈尔大学, 日内瓦大学, 以及美国社会学学会, 感谢你们的建议、资讯、批评和忠告。作为 Marc Lerner 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 我有幸领教他对施维茨、苏黎世和沃州无与伦比的了解, 他提醒我在叙述瑞士历史时不要太过莽撞, 这也促使我尽最大的努力不去剽窃这位青年才俊对于欧洲民主化的独特而有价值的研究。感谢 Stephanie Sakson 精心可靠的编辑, Robert Swanson 制作了条理分明的索引。在我写作本书和另一些文章时,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梅隆基金会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共同资助我两度旅居国外, 并举行了多次学术会议。

目录

前言/1

第1章 抗争与民主/1

第2章 政体及其抗争/39

第3章 欧洲的非民主抗争(1650—1850年)/65

第4章 法国/88

第5章 不列颠群岛/124

第6章 作为特例的瑞士/159

第7章 1815—2000年欧洲的民主与其他政体/196

第8章 欧洲与其他地方/232

参考文献/247

译后记/272

第 / 章

抗争与民主

跟 20 世纪的报纸不同,1871 年 3 月 30 日的《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第一页全部刊登分类广告、官方声明和市场报道。但是,到了第 4 页,就像往常一样,刊登即日的政治事务:对于“巴黎选举的结果”,《里兹信使报》的编辑声称:

赋予公社这样一种权威,它是随着非法地宽恕了一场造反而篡夺来的。然而,很简单,这种篡夺而来的权威,建立在少数人投票的基础之上。多数人都弃权,这样就似是而非地批准公社去做一些他们没有勇气去抗议或反对的事情。胜利是,并且常常是,凭恬不知耻地以自由的名义来实施权力而夺取的。这一刻,无秩序的、无政府的、革命的和暴政的党派胜利了,自由、平等和友爱挂在他们嘴边,他们靠恐怖统治维持一时,但是对于另一代来说,法兰西共和主义将又一次沦为他们口中的笑柄。

《里兹信使报》的编辑将三个通常被 19、20 世纪的评论家,特别是英法的反革命家挂在嘴边的话题结合在了一起:当前斗争与 1789 年革命的比较;革命与恐怖的联系;如果发生一场革命,那它万万不可能代

表多数意志。

在以同样腔调说了一大通之后,这位编辑发表了一种严厉而极端可怕的判断:

眼下,公社并无合法权威。它不过是一个革命实体,政府的权威并没有被推翻,夺权不可能在不危及国家的合法政府的情况下得到承认。这里有(或许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巴黎市政当局进行一场改革。其实,改革的必要性已经被承认,除非公社的暴力强奸民意,这场改革现在就可以迅速到来;但是,万万不可让给巴黎自治并独立于国民政府的权力。这种要求是无理取闹。有太多理由担心,它图谋让财产成为祸害而不是福祉,将税收负担强加给富人,以国家为代价给穷人提供工作。只要这些理论还停留于理论,法国可以一笑置之。它们不过是空想家的幻梦而已。不幸的是,这些空想家在巴黎当权,并且极有可能要去实现他们的梦想,不惜一切代价,盲目地追求他们的目标。

这位编辑,用一个预言来结尾:公社将留下一笔遗产,那就是“苦难,悲伤,无人可以幸免,最深受其害的还是穷人”(Leeds Mercury, 30 March 1871:4—5)。这样,依《里兹信使报》所言,法国人民又一次显示了他们的革命冒险主义倾向。暴力的胜利,在一名自以为是的英国人眼中,唯一能带来的,就是理性和民主秩序的长期失败。

到底发生了什么? 1848年,法国革命者用共和国取代了他们的君主制,为失业大众提供了工作,极大地扩展了工人的权利,包括近乎普遍的成年人选举权。1851年底,选举产生的总统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过去那位拿破仑皇帝的侄子)发动一场政变,将共和国扫地出门,在随后几年创造了他自己的帝国。路易·波拿巴政变,伴随着日益动荡的统治,启动了18年的城市化、工业化、政治巩固(political consolidation),最后是统治局面越来越动荡的自由化。与普鲁士的战争导致了它的垮台。1870年9月1日,法国司令官麦克马洪将军投降,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活捉拿破仑三世。三天之后,一场相对和平的革命结束了帝国,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国民自卫政府。但是,普鲁士军队乘胜追击他们的法国敌人。1月5日,普鲁士开始对巴黎进行重重包围。德国大炮轰击这座城市达三个星期。

9 000 人的国民自卫队和常规军在勉强上阵的特罗胥将军(General Trochu)的带领下突围失败,在1月19日退至凡尔赛。1月28日,法国国防政府当局签署停战协定,将巴黎要塞交给德军。但是,巴黎市民在政治俱乐部中进行动员,并由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穿针引线,开始组织城市抵抗和自治。在巴黎和其他地区,激进派鼓动发起对普鲁士的战争,还要求建立一个更分权和民主的政府形式。一个由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领导的,以波尔多(Bordeaux)为基地的新国防政体,削减了国民自卫队的军饷。它还通过了一些徒劳无益的措施,呼吁巴黎市民恢复交租和其他常规义务。

为了破坏巴黎市民的反抗,梯也尔下令他的军队收缴国民自卫队的大炮。军队企图在3月18日黎明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定此事,不料把巴黎市民都唤到了街上,导致两名将军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被杀,引爆了《里兹信使报》不久后所说的另一次革命。危急之际,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占领了巴黎市政厅(Hôtel de Ville),成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市政府。在一场全市范围的选举(星期日,3月26日)之后,革命领袖掌握了政权,3月28日宣布巴黎为一个自治公社。直至两个月后政府军攻入城市,逐条街道地收复失地,公社都是通过一个建立在革命委员会基础上的结构来统治的,以邻里为基础的国民自卫队则得到遍地开花的民众团体(popular associations)的支持。(Gaillard, 1971; Gould, 1995; Greenberg, 1971; Gullickson, 1996; Johnson, 1996; Lafargue, 1997; Lissagaray, 1969; Rougerie, 1964)。

公社声明几乎过去整整一年之后,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厅发表讲话,比较了1832年和1867年的英国改革法案:

格雷勋爵,为1832年议案呕心沥血,这无疑是一项政治家式的议案,在某个时候,它似乎是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通过这项议案,他加强了贵族的合法性影响,并且迎合中产阶级伟大而有益的公民权(franchises,也可译为特许权,下同——译者注);但是他不仅没有在宪法中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权留下余地,而且还彻底废除了那些工人阶级自古以来所独有的古老公民权。先生们,这是宪章运动的起源,也是我们国家大约35年来存在的与选举有关的动

荡的来源。(Times, 4 April 1872:5)

狄士累利所言不虚。重温 1830 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竞选活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活动家声势浩大的动员,制造了一场危机,英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做出回应,通过了 1832 年改革法案。这个法案不仅将广大工人从下院投票中排斥出去,同时行之有效地给很多之前缺乏投票权的雇主和商人公民权,而且还在许多自治市镇中提高投票权的财产要求,而在这些市镇中,人数众多的工人之前都享有投票权。以工人为主体的宪章运动,在 1838 年至 1848 年之间此起彼伏,只是在法国大革命那一年才偃旗息鼓。宪章运动其实代表那些被 1832 年法案所排斥的人。尽管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声势浩大的斗争语境中兴起的,宪章运动所专注的,却并非工人权利本身,而是民主改革,包括成年人选举权。

进一步而言,实际上,1832 年改革法案给了自由党相对于其保守党对手的选举优势。在这个法案创造的下院议席中,有 144 个是由拥有财产的郡投票人选举产生的,323 个是由有代表权的市镇的财产拥有者选举产生的,4 个是由大学官员选举产生的。总的来看,在这些市镇,在包括了许多扎根于城市的财产所有者的郡区,自由党都表现得更为出色。在这一方面,1867 年的保守党有理由认为 1832 年改革未能充分代表他们的可能的支持者。如果他们能促成一项新的改革,将市镇在下议院的席位转给扩大的郡选区(在这些地方,地主有很好的机会左右他们的佃户和工人的投票),保守党就能够通过选举掌握权力。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公民权也是爱恨交加:适度增加似乎有利于自由党,他们可以拉拢技术工人,这些人此时更多地直接受惠于自由党的项目,但是如果扩大到赋予一般劳动者公民权,保守党就可以通过庇护人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来扩大支持。

可是自由党并没有强烈冲动同时扩大都市选区和它的下院代表权。环顾各郡和各市镇,从 1832 年到 1866 年,下院议席都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同一时期,由于乡村财产的升值和都市的资本化,很多人已经越过投票的财产门槛。经济之扩展,使郡选区的选民增加了 40%,使市镇选区的选民增加了 82%。但是每个市镇和郡的下院议席数目却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在自由党喜欢的地区,每个下院议席相对的

选举人数目,较之保守党喜欢的地区上升得更快。代表权与地方人口比例的动向,特别是增加市镇议席数目的动向,都有利于自由党。1865年以来,改革联盟(Reform Union)和类似组织,将中产阶级激进派和工人阶级活动家都卷入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援下院改革的公众集会和游行活动之中。所有这些都是错综复杂的下院斗争的背景。在此期间,1866年,自由党无法促成其党魁的改革议案,但是保守党得以让他们自己大刀阔斧的修正版在1867年通过。

狄士累利在1867年法案通过之时领导下院,他揶揄自由党年复一年清谈改革却无所作为。他认为保守党是更具决断力的:

先生们,结果呢?在1848年发生了一场法国革命,成立了一个共和国。没有人可以忘记这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什么影响。我犹记得那天,当大炮架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时,伦敦的妇女不敢离开家门半步。一年之前,在法国发生了另一场革命,又一个最可怕的共和国成立了。在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你叫不齐半打人到街上集会游荡。为什么?因为人民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心满意足且心怀感激。(Times, 4 April 1872:5)

因此法国给人革命的教训,而英国给人民主的教训。英国人每每以此自吹自擂。

诚然,5年前,很多保守党——包括下院一些资深的保守党人士——都将1867年改革法案看作革命的序曲。卡纳文勋爵(Lord Carnarvon)一谈到狄士累利就暴跳如雷:“如果阁下之政治伦理,是从政治冒险家的伦理中借来的,那你尽管信赖它,而你的代议制度将整个儿粉碎在你的脚下。”(Evans, 1983:351)根据规定,改革法案将选区增加了将近一倍,允许绝大多数男性工人阶级户主给下院候选人投票。一个时代拉开了帷幕,自由党和保守党都不得不去估计他们的政策对工人投票的影响。狄士累利最后的招数和让步,产生了一个甚至比领先的自由党所倡导的更为激进的法案。然而,回首往事,英国统治阶级都普遍庆幸,靠司法上扩大选区,进而扩大整个政治生活,他们避免了一场革命。他们也常常指责隔海相望的抗争性法国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解释抗争、民主化及其联系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英国人的自我形象,巴黎公社期间英法政治的比较,在抗争的形式、动力和后果上,都显示出深刻的民族性差异。这种比较提出了一个关于民主政治根基的问题。抗争政治中的民族差异和民主的不同起源,对这二者的考察合而为一,汇成本书穿行的河流。从上游放眼望去,《欧洲的抗争与民主》关心的是,解释抗争政治之后如何走上不同的发展轨道——在抗争政治中人们基于各自的利益而提出一致的诉求。从下游放眼望去,同一本书关心的却是民主制度的不同起源。如果这本书写得不错,它就会让两条溪流,尽管要各自为战,却最终能够汇于一处、水乳交融。解释各种不同的抗争政治,也就是解释抗争政治的一个罕见的、偶然的后果——民主。

1825年和1871年之间英法两国经验的对照,只是本书力图解释的欧洲世界的一个侧面。法国方面:从革命到革命的运动,经历了一次短促而动荡的民主试验,威权政府的回归,一个随战争而来的踌躇不定的民主化和扩大化的抗争阶段,政体的分裂,以及新的革命尝试。英国方面:为宗教权利和下院改革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动员,被对外部人(outsiders)的适度让步盖住了风头,加紧对爱尔兰异见者的控制,遍地开花但收效甚微的争取工人政治权利活动,爱尔兰军事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相互牵制的斗争,如果不是在爱尔兰,至少也在英国产生了某种民主化。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的经验中,我们都目睹了民众抗争与趋于民主的政体变迁之间的内在互动。

19世纪法国和大不列颠的历史,难以穷尽抗争政治和民主的范围。在21世纪的世界中,南非、斯洛文尼亚、哥斯达黎加、印度、加拿大和葡萄牙都被当作各式各样的民主,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看,英法的经验就显示出强烈的相似性和联系:各种相似且互动的模式,如组织化工人的合法化,公共秩序政策,公民权的扩展,民众的责任性政府的形成,政党的创建,等等。两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和活动家反复沟通,若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时候相互借鉴政治解决办法,更常见的反应是标新立异,以